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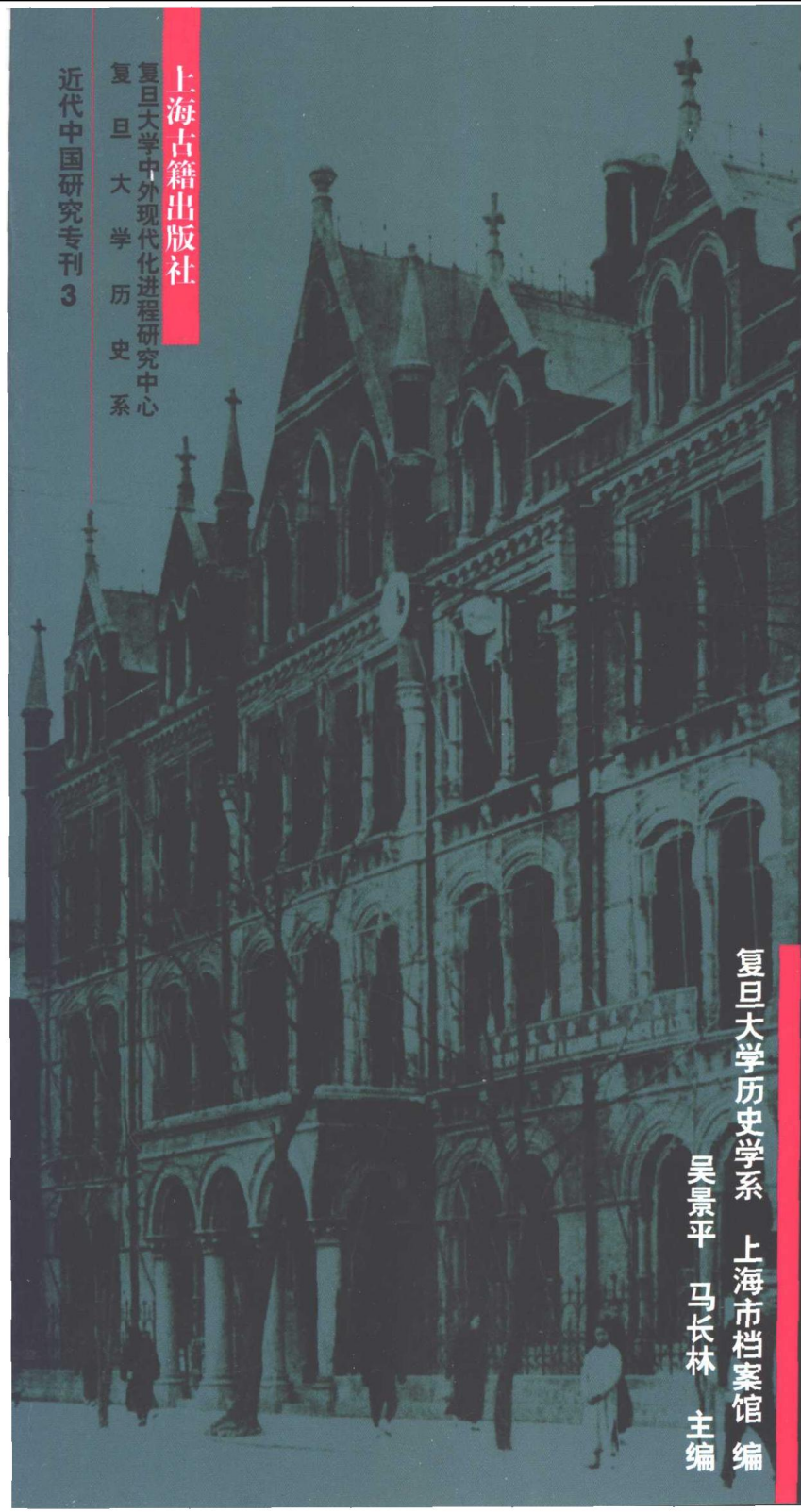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市档案馆 编

吴景平 马长林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历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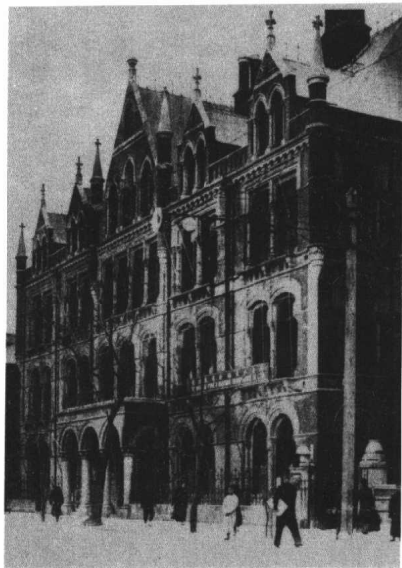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3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市档案馆 编

吴景平 马长林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历史系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吴景平,马长林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0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3)
ISBN 7—5325—3520—7

I. 上... II. ①吴... ②马... III. ①金融—经济史—研究—
上海市—近代②金融—经济史—研究—上海市—现代
IV. 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635 号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3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上海市档案馆 编
吴景平 马长林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8×1156 1/32 印张 19.875 插页 5 字数 516,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520—7

K·506 定价:4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目 录

一、两岸典藏有关近代上海金融档案史料

-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资银行档案述评…………… 冯绍霆 3
从台湾典藏档案管窥上海金融(1927—1937 年)
…………… 卓遵宏 15

二、近代上海金融业的崛起和金融中心地位

- 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的互动…………… 戴鞍钢 55
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 …… 杜恂诚 67

三、近代上海的金融业同业组织

- 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 [韩]金承郁 83
1927—1937 年上海银行公会述略…………… 王 晶 102
折冲于官商之间:1929—1931 年上海银行公会改组
风波述评…………… 吴景平 137
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 林美莉 166
上海银行公会(1918—1949 年)始末、作用影响及现
存档案状况…………… 陈正卿 193
试析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的互动关系:
以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之筹建为中心(1921—1929 年)
…………… 何 品 209

四、近代上海华资银行

外资银行夹击中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开办初年与外资银行、洋行、厂矿企业的业务往来 及其思考	谢俊美	239
商办四明银行兴衰述略(1908—1937年)	黎霞	249
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评述	杨天亮	267

五、近代上海的证券、保险和征信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证券市场的国营事业股票问题	刘志英	289
英商保险业在近代上海的投资与经营(1843—1937年)	赵兰亮	312
论中国寿险市场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	陈麟辉	374
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及其信用调查	庄志龄	403

六、金融业的放款投资

民国时期银行界放款决策机制探析	马长林	421
中国第一家投资公司——以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 投资经营活动为例	郑会欣	436
民国时期上海的工业金融——以金城银行对于棉纺 工业的融资为例	[日]久保亨	452
对1930年代中国纺织业的金融资本的认识	[日]富泽芳亚	475

七、金融风潮、金融与政局、银行家

论1929—1930年上海的“金贵银贱”风潮	戴建兵	491
1934—1935年白银风潮与上海金融市场	[日]城山智子	516

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 颁布与上海银钱界的反应	冯筱才	527
1927年蒋中正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	王正华	565
民国银行家唐寿民生平述论	邢建榕	602
附录 “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综述		
	吴景平 史立丽	617
编者后记		630

一、两岸典藏有关近代上海金融档案史料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资银行档案述评

冯绍寔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银行档案。仅以本国资本所设银行计,总数当在 170 家左右。它们的档案将近 4 万卷,约占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的 2% 左右。这些档案中,最早的为中国通商银行 19 世纪末成立时形成的材料,最晚的则是上海银行业公私合营时形成的材料。无论就数量还是就价值而言,它们都是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也是利用率比较高的一部分档案。

大约 170 家银行当中,有中、中、交、农四行,以及其他一些官僚资本控制或有官僚资本投资的银行,也有私人资本银行。既有中国通商之类历史悠久的银行,也有 20 世纪 40 年代才开设的。著名的北四行、南三行固然都在其内,大量的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它们的档案,大致通过两条途径被集中了起来。如中、中、交、农等官僚资本银行,上海解放后即被接管,档案随之被集中起来,保存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上海分行的档案室,1956 年随华东大区的撤销移交华东临时档案保管处。上海市档案馆成立后,这些档案被移入该馆。之后有部分档案被移交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大量私人资本银行的档案,则随各家银行先后公私合营而陆续被集中。集中之初,这些档案被移入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档案室。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被上海市档案馆接收。

一般而言,历来受到学者们关注的银行保留下来的档案相对比较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都有数千卷之多,尤其上海银行以6722卷为最多。而那些小银行的档案,大抵残缺不全。1940年设立的大公银行,1948年被查出虚设暗帐而获停业处分,馆藏档案仅停业前的区区5卷。^①成立于1941年的中庸商业银行,1950年停业,现存仅1941至1945年间的7卷档案。^②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上海市档案馆专设银行档案汇集^③,包括了90余家银行,全部档案才116卷,平均1家1卷挂零。这固然与当时许多银行业者不重视档案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功的银行之所以成功,与它们管理有方密不可分。档案,既是管理有方之后才可能产生的结晶,也是管理有方、从而经营得法、从而脱颖而出、从而为人注目的直接证明。

所有这些银行档案已经作了系统整理,编成案卷,编制了目录。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向社会开放,查阅者可以自行检阅目录,查找所需要的材料。其中有些档案,如金城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已经有一部分被编成资料书出版。

尽管已经整理出版了几部银行档案史料汇编,但是查阅原档的必要性仍然不言而喻。那些汇编篇幅有限,几十万至多上百万字的篇幅,显然难以同成百上千卷的档案相比,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它们一方面受编辑体例的限制,只能在汇编所要表达的内容范围内选择材料,通常只能反映有关对象的基本概貌、基本特点,不可能将所有重要方面都反映得巨细无遗。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眼光各不相同,汇编史料时难免受编辑者的喜爱、倾向等的影响,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偏移。如此,有用的史料没有编进去之类的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出来,不断需要发掘新的史料,决不是只依靠少数几部汇编就能解决所有研究者的需要的。更何况,还有更多银行的档案还

没有整理出版。

二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急剧变化,从一个多功能的经济中心,一变而为比较单纯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至多再加上个商业的中心。原先金融中心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消失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银行仍然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振兴上海,把上海建设成为四个中心,不只是一种呼声,已经成为一种正在逐步实现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上海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问题,包括旧时银行的状况,并非是一种怀旧情结,更有现实的需要。不少人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可能受到的冲击而担忧。这种心情不是不可理解,但如果了解上海历史上内国银行的发展情况,就不难感觉,这种担心多少是被夸大了的。当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率先成立,而后又有本国资本的银行陆续设立之际,正是外国银行早已成为雄视中国的金融巨头之时。它们与在上海市场根深蒂固的钱庄相结合,在金融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可以左右一切。然而,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新生的内国银行毕竟在重重艰难之中,不到30年就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形成与外国银行、钱庄鼎足三立之势。不但三分天下有其一,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银行面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中资银行,一度企图以组织中外银行公会进行控制。而中资银行开出的条件是,这个公会的主席要中外双方轮流担任。外国银行的如意算盘终成泡影。^④从档案中可以发现,有的银行,如福昌银行,实际是从钱庄改变而来。^⑤而著名的钱业中人秦润卿,也在1929年与王伯元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垦业银行。^⑥上海钱庄清中叶已经出现,开埠后与外国银行结合在一起,成为上海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1930年前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说明了中资银行的发展不可小视。当时

的中资银行尚且能做到这一点,今天的银行面对挑战,似乎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正是这一段历史的证明。研究任何历史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发生关系。虽则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温习这些档案,应该受到很多的启示。这,或许是这些档案在今天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当然,这些档案中保存了大量有关银行的史料,对于有关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一段时期以来,有关现代企业制度,有关股份制的商业银行的话题,引起了人们极高的兴趣。解剖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银行的情况,对于当今银行业的建设,不会是无益之举。笔者在翻阅那些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存留下来的档案时,不无惊讶地发现,其中几乎都有有关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如何组成、如何活动之类的记载。可能一家银行保存下来的档案为数并不多,可是董事会议记录之类材料却不少,有不少甚至相当完整。从这个事实也不难推测当时的银行是在一套怎么样的模式下运行,董事会做些什么事,监事会如何运作,股东大会怎么召开,等等。这些,对现在的银行来说可能不无借鉴。比如说,笔者在查阅档案时注意到,那些私人投资的银行,虽说总有几个大股东,但是小股东也都为数不少,股权比较分散。检阅 170 家左右的银行,少有家族投资建立者。只有一家 1929 年开办的惇叙商业储蓄银行,从档案中可知是宁波蔡姓商人所办,以堂号为名。^⑦这或许也可算是一种家族投资,但是这当是中国式的一个家族的人共同投资,与一般所理解的家族式投资只限于一个家庭,或是与此家庭有关的少数亲朋好友,大概还有少许差别。仔细地研究那些银行的运作机制,对于今天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会毫无益处。

银行档案中,有关它们的沿革材料,当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尽管不少著名的银行是如何成立的,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但是,有些银行成立之际的细节,大概已经难以为现在的人们熟

悉。比如,中华银行,人们可能知道它是在上海光复时陈其美参与创办的一家银行,曾为革命军筹集款项作出过贡献,其他情况可能就所知不多了。而在档案中保存了它向当时的工商部、财政部登记立案的文件,读来令人长了不少见识。据该行 1912 年 11 月间给工商部、财政部呈文称,它设立于 1911 年旧历九月间,系“奉前沪军都督命令,会合绅商筹集股款,为沪军临时财政机关”,“自军兴以迄罢兵,幸无意外之变”。开办之初,定为“官商合办,嗣因公家财政困难”,经“公议改组,额定股本上海规银壹千万两,先收一半。纯为商业性质,商股商办”。然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工商部、财政部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先后四次拒绝批准立案。一直要到 1915 年才正式成立。^⑧其间的曲折,其他的资料中难以看到。

政治局势的变动必然引起经济中枢的银行产生大变动,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怀疑。比如,“八·一三”抗战之后,人们比较熟悉上海工厂的内迁,其实银行也有内迁的。几家大银行不用说,经营的重心随国民政府的西迁终至入川。而从档案中可以看到,一些较小的银行,如茂华银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孤岛不复存在,这家开设不久的银行也就迁往重庆,直至胜利后才迁回上海。^⑨至于抗战之后停业的,也为数不少。1926 年设立的中孚银行,抗战时就收束业务,胜利后才重新开业。^⑩1931 年由钱庄演变而来的福昌银行,也在抗战中停业,1945 年才复业。这些变动,虽然可能包含商业上的原因,大概也不能排斥政治上的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投机盛行,出现过畸形的繁荣,开设银行几乎是一种时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下令,一些与日伪有关,或由日伪批准设立的银行一律停业。由此关门大吉的当不在少数。然而,只要找到靠山,大概也不会遭到一刀切的命运。官商合股的农商银行虽然 1921 年就在北京成立,但是沦陷时找到陈公博当常务董事,1946 年被下令停业清理。但在走通了吴铁城的路子后,居然免遭厄运。^⑪1941 年创立的同孚商业储蓄银行,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奉命清理,大概出于类似情况,不久就复业了。^⑫

至于1941年设立的五洲银行,1945年不得不停业。^⑬又如1942年发起的工商银行,也在1945年停业。^⑭大概都同它们没有找到有力的靠山有关。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场一度颇有起色,不光是原先停业的银行复业,一些外地的银行也纷纷迁来上海。其中所谓川帮银行不少。1913年由商号改组为银行的聚兴诚,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添设分行。^⑮1944年由两家钱庄合并而成的建业银行,1946年干脆在上海设立总管理处。^⑯原在重庆的合诚银行,194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⑰此外,原在浙江的瓯海银行,本以发展地方实业、调节地方金融为宗旨,1946年起也在上海设立分行。^⑱江西的源源长银行1946年设上海分行。^⑲当然,抗战对上海银行业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几家银行的停业复业,也不止外地银行到上海开设分行,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上海解放,当然对银行业的影响更大。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被接管,这一类银行姑且勿论。私人资本的银行则先后以不同方式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其中的详细情况,已经有不少资料有所提及,而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银行档案中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材料。除了编号为Q376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全宗^⑳的档案外,其他许多公私合营银行本身的档案中,都有许多记载。它们应该比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会详细得多。

这里只就笔者所见的档案,就中资银行发展史上几个点的情况稍作说明,而且各个银行还有各自的特点,这里无法一一细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想了解中资银行的发生发展,这批档案是不能不查阅的。

三

研究银行,不光要了解它何时设立,何时结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了解它们的业务方面的各种情况。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

各家银行档案中,大量的业务档案,对于了解其业务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之中,年报之类的综合性材料,当然不在少数,从中可以找到许多学者所关心的史料。其他种类的档案材料中,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史料,恐怕也不在少数。

研究银行的学者大多清楚,解放以前,中资银行较少投资工业。除中国、交通、金城少数几家外,其他的银行,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很少有向工业企业贷款或投资的。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这批银行档案,印证了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有关银行投资、放款的档案不足观。事实上,有关银行投资方面的档案尽管为数并不很多,人们从中还是可以知道不少情况的。从它们中间不仅仅可以了解到银行投资工业的情况,由于档案中还保存了相当数量的被投资企业的档案,以及有关银行对企业或者市场情况的调查材料,学者甚至可以了解银行以外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档案中有关投资方面的材料多达500余卷。除了工业企业,也有如华南米公司、永安公司等商业性的机构。从档案中看出,有些企业甚至是中行独资,或投资比例相当高的,如广西合山煤矿等。这一类企业稍少。比较多的是少量投资,或是短期资金往来的。对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对于中国银行的投资方向、活动范围等方面应该可以取得比以往更深入的认识。^①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档案中,有关投资部分的档案不及中行那样多,而且主要是抗战以后的一些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全宗里有放款生产事业合作大纲,以及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的材料,这对了解抗战胜利以后对上海工商业贷款的大致情况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②

有些看似业务性的档案,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发掘出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笔者注意到,中央银行上海市分行1939年的档案中,有一批收购黄金的材料。这一年4月25日中央银行上海分行收到重庆总行业务局和稽核处来电,指示上海分行,“中国实业沪行如有金类分批送交尊处,请随时照收”。当时上海已经是孤岛,

大量收购黄金,万一发生变故,难免为日伪所用,兼之其时法币头寸也紧。更令人吃惊的是消息已经走漏,市面上标金已经上涨了20多元。上海分行27日急向在香港的席德懋请示,应该如何办理。这份电报里称,中国实业沪行所存标金为百余两。席接电后,立即向重庆查询,并要求缓办。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告诉席,此事系“奉命办理,全无成见”,席也无可奈何。30日,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又收到重庆收兑金办办事处的电报,说是“沪市存金约25万两,有资敌之虞,奉院长谕,应速由中央银行设法与金铺商购”。严令之下,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只得照办。但奇怪的是,说是“与金铺商购”,实际上只有中国实业银行的上海分行在办理此事,至5月18日,共收购9296两余。^②

由于时间有限,笔者不可能普遍地查阅更多的档案,只能随机抽阅了几份,其中就发现了上述材料。虽则涉及数量不大,或许在中央银行看来只是一件普通的业务,但终究令人感到有些蹊跷。究竟是主持中央银行的孔祥熙不熟悉金融业务,心血来潮瞎指挥,还是背后另有文章,甚至是在谋个人私利,只有在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有结论。这里只是提一下,为私人谋利的可能性大概是难以排除的。就在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档案中还记载了1941年8月间,该行奉总行秘书室来电,代为购买战国郢金、元明宝钞和咸丰钞一事的处理经过。^③银行与博物馆有别,收藏这类古董可能与银行业务并无多大关系,比较可能的,就是这是为某一收藏家代购的。有此一例,上述收购黄金一事,是不是也可以类推呢?当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这是相当危险的。然而,不能排斥有这样的可能性。

可以设想,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银行档案中,类似的疑团可能还有不少,认真地发掘一下,开展深入的研究,收获肯定不小。

四

银行档案中,除了与银行本身,或是银行业务有关的档案之

外,还有一些可称之为银行家档案的。钱新之、唐寿民长期服务于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全宗里就有不少两人的材料,既有他们处理行务的,也有与行务并无密切关系者。其他如周作民之与金城银行,李铭之与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陈光甫之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包玉刚之与上海市银行,都是类似的情况。

银行家们在兹念兹,这些档案当中,大量与银行业务有关。有些本身就是在处理业务过程中形成的,也有些是对于银行业务的探讨。在这方面,陈光甫的档案中尤其多见。上海的中资银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自有外部客观因素有作用,这批银行家的自身努力也功不可没。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中的这批中资银行档案,就为研究这些银行家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还应该注意,他们的成功,以及银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使得银行家的活动远远超出了银行的范畴,涉足于社会、政治等等方面的活动。甚至可以说,研究这些银行家,更多地不是将他们仅仅看作一个银行家,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来看待的。陈光甫等人与国民党的关系错综复杂,档案里有诸多记载可供研究。他们对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相对而言比较热心,档案里许多材料可资证明。笔者曾与人合作,依据银行公会的档案,以及有关的报刊资料对刚刚形成的银行家阶层作过一番探讨,自信颇有收获,认为这些银行家的思想、主张和活动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是上海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⑤但是,当时是将这些银行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更多地注意的是他们的共性。而人们可能更希望了解他们个人的特点,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就不可不注意银行档案中有关他们个人的材料。

这里就笔者所见一些钱新之的材料略作说明。

钱新之的个人材料中,有大量的往来信函,从中不难看出钱与有关人士的关系。国民党内派系众多,人所共知。钱新之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但并非来者不拒。陈果夫曾经要求钱,让 CC 大将王延松当交通银行董监事,被钱婉词推却。^⑥抗战胜利后,吴铁